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

——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童 星 张海波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

——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童星 张海波 等著

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张健

书号 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作者 童星 张海波

责任编辑 张海波

南京新华书店印刷厂

南京新华书店印刷厂

880×1230 1/32 印张 1.42 印数 1000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2-04939-5

25.00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其识别: 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童星, 张海波等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305-04939-2

I. 中… II. ①童…②张… III. 社会管理: 风险管理—研究—中国 IV. 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135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其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作 者 童 星 张海波等

责任编辑 孟庆生 编辑热线 025-83597482

照 排 江苏竺桥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9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4939-2

定 价 2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l@publicl.ptt.js.cn

目 录

上篇 理论探讨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及其启蒙意义	3
一、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	3
二、风险社会的启蒙意义	11
第二章 社会风险与社会转型	38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	38
二、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风险	50
三、推进观念更新,化解社会风险	61
四、调整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社会	80
第三章 社会风险与社会冲突、社会失范、社会分层	88
一、社会风险的含义	88
二、来自社会冲突的风险	93
三、来自失范的社会风险	103
四、来自社会分层的风险	113

目 录

第四章 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	128
一、社会风险的研究现状	128
二、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整合研究框架	142
三、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整合研究路径	152

下篇 经验研究

第五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失业社会风险	167
一、“十一五”期间江苏失业社会风险的发展趋势	168
二、“十一五”期间江苏失业社会风险的结构特征	172
三、“十一五”期间江苏失业社会风险的应对策略	176
第六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农民失地社会风险	183
一、农民大量失地的缘起	183
二、失地引发的粮食安全风险	186
三、失地引发的政治风险	191
四、失地引发的经济风险	193
五、建立社会保障,化解失地风险	196
第七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市场社会风险	202
一、江苏市场社会风险的重要类型	202
二、江苏市场社会风险的主要成因	207
三、江苏市场社会风险的防范对策	213
第八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房地产社会风险	219
一、“十五”期间江苏房地产市场回顾	220
二、“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房地产社会风险	223

三、“十一五”期间江苏房地产社会风险的源头分析	230
四、“十一五”期间江苏房地产社会风险的应对策略	234
第九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乡村债务社会风险	239
一、乡村债务的主要来源与表现形式	240
二、乡村债务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242
三、乡村债务的主要成因分析	245
四、规避风险的债务化解之道	250
第十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报复社会型风险	253
一、“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种类	254
二、“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的主要特征	257
三、“十一五”期间江苏报复社会型风险增大的原因	261
四、“十一五”期间江苏应对报复社会型风险的策略	268
第十一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风险	273
一、“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面临的三大潜在风险	274
二、“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潜在风险的主要特征	278
三、“十一五”期间江苏安全生产潜在风险的防范对策	284

目 录

第十二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食品安全风险	289
一、江苏食品安全现状及原因	290
二、食品安全风险的概念	295
三、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建议及江苏的实践	298
第十三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网络安全社会风险	307
一、网络社会风险的出现及其时代背景	308
二、网络社会风险的类型及其特征	311
三、网络社会风险的趋势及其防控	316
第十四章 “十一五”期间江苏自然灾害风险	320
一、江苏自然灾害情况	321
二、自然规律与人类活动的冲突	325
三、综合减灾理论的确立	328
四、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减灾能力——兼论江苏的实践	332
参考文献	337
后 记	351

上 篇

理论探讨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 及其启蒙意义

一、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引发世界性危机,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佐证。10年后,英国疯牛病的暴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使风险社会理论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之一。贝克也由此跻身于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行列。

不约而同的是,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hott Lash)也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做出了类似的回应。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这样描述道:“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的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及其启蒙意义

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①拉什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伴随风险文化时代而来的也许是人类许许多多的惶恐和战栗,并且不再有小规模的恐惧和焦虑”。^②历史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印证了学者们对风险社会的理论洞见,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现在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新社会。而且这种反思已经超越了纯理论的学院派探讨和夸张的口号式预言^③,在诸如禽流感的全球性暴发、南亚大地震和“卡特里娜”飓风等一连串事件的重压之下,显得如此现实、必要与紧迫,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

在关于风险社会的诸多探讨中,贝克、吉登斯和拉什三人的理论无疑是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贝克从生态和科技的角度,吉登斯从制度的层面,拉什从文化的视角,分别对风险社会进行了研究。贝克看到了核裂变的放射性污染、空气和水的毒化、森林的消失等工业化的“副作用”(the side effects)给人类带来不可预料的可怕性后果。他写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5.

② [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③ 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西方学界围绕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答案:乐观者信心满怀,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形容它为“第三次浪潮”,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看到了“网络社会的崛起”;悲观者忧虑重重,如罗马俱乐部揭示了“增长的极限”,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到了“文明的冲突”,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预言了“大分裂”。相比这些学院派的探讨或口号式预言,风险社会理论无疑更富有洞见,更令人警醒。

④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①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一开始就指出了“现代性的断裂”(the discontinuities of modernity)。他认为现代性具有双面的特征,除了“机遇的一面”(opportunity side),还有“阴暗的一面”(sombre side)。拉什的探讨是基于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阿隆·维达斯基(Aaron Wildavsky)观点的发展。道格拉斯和威达斯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没有增加,相反的是被觉察、意识到的风险增加了。他们提出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并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归结为三种文化,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拉什则认为,不能仅仅从自然风险来判断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否有所增加,而主要应该看到社会结构所面临的风险。从个人主义消长的意义来看,从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的意义上来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②拉什不同意贝克和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视角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风险是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情境下有着不同的话语解释,不同群体对此的解读并不一样,因此,风险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结构所支撑的社会中,例如贝克所关注的风险分配问题和吉登斯所关注的现代性后果问题,都是建立在假定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并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的基础上的。但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因为风险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拉什宣称,风险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且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和反制度的社会状态中。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20.

② [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及其启蒙意义

因此,在风险文化时代,治理社会并非依靠制度,而是依靠价值和理念。此后,荷兰的沃特·阿赫特贝格(Walt Achterberg)和英国的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等欧洲学者,也都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但毫无疑问,贝克、吉登斯、拉什已经分别从生态和技术、制度、文化等主要视角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风险社会的大致图景。

风险社会是全球性风险社会。贝克指出:“以污染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①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全球性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the boomerang effect),即生产风险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即使那些将危险工业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达国家也不能例外,因为工业污染和破坏是不理会国家边界的。^②2001年,贝克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中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含义在于,“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 and 一连串风险,这些问题和这些风险又与权威机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③。吉登斯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运用“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解释风险社会时指出,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23.

②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37~44.

③ [德] 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一、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

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①吉登斯进而认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都可能带来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带来的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的生态恶化和军事极权主义可能带来的核战争等。^②拉什笔下的风险文化更是全球性的。在谈到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全球信息文化中如何对未来的世界风险进行准确定位时,他认为,在工业时代,各种各样的生产材料和工业产品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描述的全球网络虚拟社会中,信息和通讯的传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风险文化时代。在传统社会形态中,还没有出现可以涉及全人类存亡的风险,因而传统社会形态是一种安全文化;而在风险文化时代,伴随而来的不再是小规模의恐惧和焦虑。可见,无论是贝克、吉登斯,还是拉什,都看到了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在贝克后来的研究中,他突破了生态和科技的视角,强调了现代制度在全球的推广,开始强调制度性风险。于是,贝克的風險社会理论与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更进一步说,风险社会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全球化促进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又反过来推动了不同国家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民间合作,进一步从

① [英]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9.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及其启蒙意义

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加剧了全球化。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是同步出现的,并且当其成为当代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特征时,风险也就成为同一时期社会的基本特征”。^①

依贝克的观点是,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在于核灾难,因为它一旦发生,便是全人类的整体毁灭。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过程中的军事全球化,即组织化暴力的扩展是推动风险社会的最主要的力量。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早在19世纪,军事领域的全球化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强权的帝国主义,国际联盟体系和国际安全结构的演进,世界贸易的出现及其伴随着的世界范围军事技术的扩散,规制军事和安全事务的全球体制的制度化。现在,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世界军事秩序之中,这个世界秩序具有高度的分层化和制度化特征,广泛地存在着三个不同的等级。第一等级:超级大国;第二等级:中等军事国家;第三等级: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力量。^②在当今社会,军事全球化表现得更为明显,自从核武器问世以来,核武器的全球威慑力量已成为一国制约他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冷战”期间的核竞赛与核平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造就了全球风险社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在全球范围内制约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毁灭性风险。这也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在当今社会,对于核武器的控制权的争夺,仍然是全球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民族国家对于核武器的“崇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扩散,以及国际联盟体系的规制,这些因素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全球风险社会有力的注脚。

① 杨雪冬等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②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一、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

当然,全球化是有多种含义的,不仅仅体现在军事领域。罗宾·科恩(Robin Cohen)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对全球化归纳了6种理解: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世界所有居民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增加;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强;跨国行为者的发展和跨国组织网络的扩展;全方位的一体化。^①正是由于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关于全球化的激烈论争。戴维·赫尔德将这些论争概括为三个宽泛的流派: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及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的立论基点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通过建立生产、贸易以及金融的跨国网络实现经济的“解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政府不过是全球资本的传送带。怀疑论者则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绝不是前所未有的,且国际化力量并没有摆脱国家政府的控制,相反还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实现。变革论者承认全球相互联系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民族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衰落或削弱,而是在重组或重构。不管如何争论,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加强确是事实。在此基础上,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②由此,他们概括出全球化的四个维度:网络广度、联系强度、流动速度和影响程度,即跨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联系紧密的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网络,现代运输和通信体系支撑的物资与信息的全球流动,事件的全球影响。

因此,风险社会与全球化至少在下述四个方面实现同步:

^① Robin Cohen and Paul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2000.

^②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及其启蒙意义

一是跨越民族国家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带来了风险的扩散。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污染,带来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像挪威和瑞典这样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自身几乎没有污染严重的工业,同样也要受到影响。它们不得不以森林、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消失为代价,来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污染债。”^①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成了受害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面对全球要求改善环境的日益高涨的呼声,大多数国家所进行的计划性干预和制度性调解均宣告失败,生态论者发现发达国家所谓的环境政策不是去治理工业生产的排放物,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污染物。在风险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进行互动,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加了新的风险,使后果更加严重。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风险源的增加有三种类型:①输入型。流动的加强带来了新的风险源,最典型的是环境污染的跨国界、跨地域转移和传染病的蔓延、意识形态的入侵等。②卷入型。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有较多贸易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或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生产、贸易、货币本位体系等是主要的扩散载体,典型的有金融风险、贸易摩擦导致的行业风险等。③诱发型。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类似的或另外种类的风险在该国家或该地区的发生,人们对治理机制的不满或者对变革成功的期待容易诱发人们出现同样的风险行为,典型的有国家动乱或地区骚乱等。^②

二是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后果。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核心是全球网络的兴起,这其中又以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最为明显。全球互联网,一方面加速了全球物质与信息的流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休戚与共、生死相关。“千年虫”虽然并未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25.

② 杨雪冬的分类,其类型与本文相同,但解释不同。参见杨雪冬等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